

〔日〕岩佐昌璋 编著
李传坤 译

中国现代文学与九州

异国·青春·战争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岩佐昌璋 编著 李传坤 译

中国现代文学与九州

异国·青春·战争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与九州/(日)岩佐昌璋编著;李传坤译.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651-0263-9/I·52

I. ①中… II. ①岩… ②李…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 I 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0000 号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10-2010-345 号

本书日文版©2005 由(日本)九州大学出版会出版,(日本)九州大学出版会授权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中文简体版,©2011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学与九州
编 著	(日)岩佐昌璋
译 者	李传坤
责任编辑	高朝俊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电子信箱	nspzbb@njnu.edu.cn
印 刷	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49 千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0263-9/I·52
定 价	15.00 元

出 版 人 闻玉银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目录

001	序 章	中国现代文学与九州
021	第一章	文学家郭沫若与九州之缘
068	第二章	陶晶孙与福岡
086	第三章	张资平与九州、熊本 ——旧制五高的青春
110	第四章	夏衍与北九州
128	第五章	凝视上海的坟墓 ——鲁迅与镰田诚一
150	第六章	鲁迅与长崎
168	第七章	“满洲国”诗人矢原礼三郎与《九州艺术》
172	第八章	映照自己内心世界的“故乡” ——坂口禊子文学中的台湾与九州
190	第九章	鲁迅与郭沫若 ——与九州大学的关系
196	编后记	
199	执笔者介绍	
203	写在 中译本出版之际	
206	译后记	

序章 中国现代文学与九州

1 从实学到文学

留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在推进近代化的过程中,随着高等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在科技文化方面很快便成为亚洲的先进国家,于是汇集了众多的中国留学生。郭沫若(1892~1978)曾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桌子的跳舞》,1928)^①然而,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者的人们,当初留学日本并不是为了文学。为实现祖国的近代化,他们是以学习必要的技术和知识为目的而来到日本的。在留学过程中,不少人受文学启发而放弃原来的专业,把目光转向文学。

例如,可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创始人的鲁迅(1881~1936),起初就是学习医科的,后来则弃医从文。与鲁迅齐名、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郭沫若,最初也是学医的。本书中介绍的张资平(1893~1959)原来是学地质学,夏衍(1900~1995)是学工学,陶晶孙(1897~1952)也是学医学。由此可知,他们当初都是立志于学习

^①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53页。

实学(即应用科学)的。毫无疑问,当时正致力于实现近代化的中国,掌握这些技术和培养人才非常必要。但是,为了建设近代化国家,同样需要造就具备近代意识的“国民”,培养国家的“精神文化”。对于前者,最敏锐地意识到问题所在的就是鲁迅。他回忆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但是仅仅如此也不行,所以必须“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就是“文艺”,于是他决定弃医从文(《呐喊》自序,1922)^①。

在从实学转向文学的留学生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怀有鲁迅的这种忧患意识。例如,对于早期的郭沫若来说,比起社会变革,文学可能含有近似于自我拯救的意味。他曾写道,“我本是爱好文学的人,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到日本去学习医科”,不过,“在进大学后没一年工夫,我深深感觉着我自己的学医是走错了路。一九一九年的暑假,我早就想改入文科”^②。

总之,这些人最初都是以学习实学为目的而赴日留学的。他们在日本的大学和旧制高校里,第一次接触了西方文学,而得到这种学习西方文学机会的则是在外语课堂上。无论是郭沫若还是张资平,都是通过外语课本喜欢上西方文学的。渐渐地,他们的兴趣由此拓展到日本大正时期的小说、诗歌、戏剧、美术作品及文艺理论等。这些人通过学习和掌握日本及西欧近代文学理论与文艺作品,逐步地构筑起新的中国文学的根基。

九州的大学与旧制高校

正如郭沫若所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日本的中国

①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17页。

②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72、73页。

留学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在九州地区各高校学习的留学生扮演了其中心成员的角色。那么,培育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学校呢?

在九州,最早创立的高等教育机构,是成立于一八八七(明治二十年)年的熊本第五高校,接着是一九〇三(明治三十六)年设立的京都帝国大学福岡医科大学(即后来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一九〇五(明治三十八)年创设的私立明治专门学校、一九一一(明治四十四)年设立的九州帝国大学。此外,还有设在鹿儿岛的第七高校、福岡的福岡高校、佐贺的佐贺高校等,遗憾的是这三所高校在文学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有名作家。而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者的留学生们就曾在熊本五高、九州帝大、明治专门学校这三所学校里学习过。



1918 年的九州大学

2 张资平与郭沫若的相遇

——创造社的结成

张资平

最先执鞭出道的是张资平，他于一九一六（大正五）年九月进入熊本第五高校学习。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享受官费的中国留学生能在日本就读的国立学校仅有五所，即东京第一高校、东京高等师范、东京高等工业、千叶医专、山口高等商业（山口高商因留学生搞学生运动而停止接纳，故实为四所）。在上述学校以外就读者，则不能享受官费留学待遇。除了一高，其余四所院校均设有实学专业。但是，就读于一高的学生，毕业后可升入帝国大学。想争取官费的留学生，在报考师范、工业、医学等专业而落榜时，还可进入设在一高的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特设预科班，学习一年后再升学到其他高校。

后来结成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张资平、郭沫若、郁达夫（1896～1945）等，其实基本上都是在同一时期（1913～1914）赴日留学的。他们分别报考上述四所院校，但均告失败，于是就转到第一高校预科班就读，在那里结业后被分配到其他高校继续学习。郭沫若被分到冈山的第六高校，郁达夫被分到名古屋的第八高校，张资平则被分到熊本的第五高校。据张资平介绍，他在预科班学习时就跟郁达夫交情颇深，但与郭沫若则没搭过话（张资平自传《我的生涯》，1931）。

张资平早在熊本五高留学时就着手文学创作活动，其作品《约坛河之水》（1920）、《冲积期化石》（1922）就是在那时完成的。后来，

张资平从熊本五高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以创作多角恋爱小说而扬名，但由于他在抗战时期为汪精卫政权效力，战后又有亲日活动，因而被戴上汉奸罪名。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反革命罪被劳改，一九五九年在劳改中病死。他一生中的光辉与阴暗，都与日本有关，其命运实在令人感慨。

箱崎海岸的会面 文学结社的梦想

一九一八年夏，郭沫若结束在冈山六高的学业，直接升入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刚到福冈不久，即当年八月下旬的一天，郭沫若来到松林一带散步时，在箱崎神社前的甬道上正巧碰上从海岸走来的张资平。张资平原本应该是那一年从五高毕业的，但由于他参加了当年五月举行的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游行和集体回国运动而被禁止考试。他就是利用这次放假休息的机会来到福冈洗海水浴的。两人相遇后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

“《新青年》怎样呢？”

“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蒙性的普通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还要多。”

（中略）

“我看中国现在所缺乏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啦。（中略）要想找日本所有的纯粹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艺杂志是找不到的。”

“社会上已经有了那样的要求吗？”

“光景是有。象我们住在国外的人不满意的一样，住

在国内的学生也很不满意。(略)”^①

在上述对话中,介绍当时国内文化情况的是刚从中国返回日本的张资平,而提问的就是郭沫若。接着,张资平还谈到:“其实我早就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略)”^②

后来,两人还谈及加入该同人杂志的可能人选(郭沫若曾写道:“数来数去可以作为文学上的同人的还是只有四个人,便是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和郭沫若。”^③),还商量如何从官费中挤出印刷经费之类的事情。“我一想到创造社来,总觉得应该以这一番谈话作为它的受胎期。”^④郭沫若这样写道。的确,正是他们的那次偶遇,才孕育了后来给中国文坛以巨大影响力的创造社。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

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于“五四”文化革命时期。从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开始,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以宣传西方思想、反对儒教等传统封建思想为核心的启蒙运动。发挥其舞台角色作用的就是《新青年》杂志。由于这场启蒙运动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而达到顶峰,因而又被称作“五四”文化革命或新文化革命。在这场文化革命运动中,胡适和陈独秀提倡文学革命。他们主张废除传统的知识分子(亦即统治阶级)的文学意识及其用于表现这种意识的文

①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46、47页。

②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47页。

③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48页。

④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48页。

言古文,建立以白话文为主的新文学(陈独秀将之称为“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这场文化革命运动开始后的第一篇白话文学作品。从此便进入以白话文表达的文学时代,并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出现了形式纷呈的文学作品,进而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核。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稍早于创造社,它创立于一九二一年一月,是二十年代最早诞生的文学团体。其发起人为周作人(1885~1967,鲁迅之弟)、郑振铎、王统照、茅盾(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他们以“描写社会、阐述人生”为基本宗旨,使文学研究会继承了“五四”文化革命的精神。其机关杂志《小说月报》所刊载的作品均反映了这一宗旨,因而从他们的这种创作倾向来看,这些人被认为是写实主义的“人生派”。

同年六月,创造社在东京的郁达夫寓所呱呱诞生。在这当中,郭沫若因召集结社同人而东奔西走,发挥了中心成员的作用。最初的同入主要有郭沫若、郁达夫(东京帝大经济学部)、张资平(东京帝大理学部)、成仿吾(1897~1984,东京帝大工学部)、田汉(1898~1968,东京高等师范文学部)、陶晶孙(九州帝大医学部)、郑伯奇(1895~1979,京都帝大文学部)等。其中,郭沫若当时作为诗人已广为人知。这年八月,他出版了具有豪放、宏伟、理想主义和幻想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集《女神》。这部诗集,震撼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成为中国新诗的源流之一。接着,郁达夫也发表了小说《沉沦》(1921)。《沉沦》是一部是把留学生的性压抑与由此而产生的对弱小民族“支那人”蔑视的愤恨掺和在一起进行描写的作品(伊藤虎

丸^①评语)。由于这部作品大胆涉及性的问题,因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后来以创作话剧成名的田汉也于同年翻译并发表了王尔德的《莎乐美》。因此可以说,创造社实际上就是一个汇聚富有才华的留学生的文学团体。他们提倡“自我表现”,被称为浪漫主义的“艺术派”。

就这样,由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大相互对立的文学团体所形成的文学流派,创造了二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而郭沫若、张资平、陶晶孙则处于这一流派的中心地位。

3 初期创造社的作家群

郭沫若

前面提到,郭沫若于一九一八年夏携妻带眷来到福冈。从那以后,直到回国前的一九二四年,他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九州这块土地上。其间,他基本上都住在九州帝大医学部附近的箱崎一带,只是回国前在佐贺的熊川、古汤两处温泉作过短暂逗留。在这近七年的岁月里,他给我们留下了大



郭沫若与夏社同人

^① 1927~2003,东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主要研究创造社文学,著有《创造社研究》等。

量文学作品。其最初创作的诗歌作品被收集在《女神》里，在日记的基础上写就的旅居体验则以《创造十年》为题出版。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窥见二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和中国文学史的一个侧面。同时，我们还能通过中国作家的笔端了解日本大正时期九州地区的一些社会风貌。

郭沫若在其文学作品中使用的都是实际存在的地名，所以对于中国的文学爱好者、研究者、作家和诗人来说，诸如“博多湾”、“千代的松原”、“箱崎”、“太宰府”、“门司”等，几乎都耳熟能详。这一切全靠郭沫若，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反复提到这些地名。可以说郭沫若是向中国宣传介绍福岡和九州大学的大恩人。

郭沫若与张资平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截然不同。郭沫若回国后，便投身于革命。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但是第二年由于国民党右派发生反共政变而使北伐受挫，郭沫若也因批判蒋介石于一九二八年避难日本。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巧妙躲开警察监视，离开日本，毅然回国加入抗日阵营。不久，日本战败。接着，新中国成立，郭沫若出任政务院（即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同时作为中日友协名誉会长，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的交流活动。一九五五年率团访问日本时，转道其母校九州大学访问，受到隆重欢迎。有关这一切，武继平将在第一章进行详细介绍。

陶晶孙

郭沫若抵达福岡后的第二年即一九一九年，陶晶孙也来到了福岡。陶晶孙是无锡的富家少爷，他九岁来日，先是在东京府立一中、一高就读，然后考入九州帝大医学部。他有音乐天赋，曾以管弦乐特长活跃于九州帝大，同时也进行小说创作。他和郭沫若相识，并

与郭夫人佐藤富子之妹佐藤操结成了夫妻。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府高官的郭沫若不同,陶晶孙于一九五〇年从台湾来到日本,并凭借日语从事著述活动,直至走完自己的一生。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现代文学获得了重新评价。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三十年代初期诞生于上海的都市文学(即新感觉派)与日本新感觉派的类似性引人注目,陶晶孙作为其先驱文学家逐渐被世人认可,其作品集也得到了出版。关于他在福冈的生活与文学创作活动,小崎太一将在第二章进行论述。陶晶孙也是不得不在与日本密切的关系中度过一生。几年前,在九州大学医学部同窗会的名册里,他的本名“陶炽”一直还注着“すえ さかん”的日语读音假名,其住址和职业也写着“不详”的字样。因为九州大学医学部在那之前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毕业于本校的文学家的存在。

造访九州的创造社成员

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正是上述就学于九州的三名留学生以创造社为据点进行文学创作的活跃时期。由于他们的缘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与郭沫若的缘分),此后创造社的成员陆续造访了九州。他们分别是田汉和成仿吾。

最初来访的是成仿吾,他在六高时与郭沫若是同窗。由于他有外语和数理系的学习天赋,留学生们非常钦佩,他的这一优点也成了留学生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在创造社时期,他虽然也创作小说,但主要以写评论为主。北伐战争时期的反共政变后,即一九二八年,成仿吾去了法国,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作为共产党的一名干部一直从事着文化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各大学校长,“文革”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与张资平一样，成仿吾也参加了一九一八年的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运动，以集体回国方式回到上海。他原本已无意在日本继续学业，但他的一位陈姓同乡因患失明症，希望到九大的眼科做手术，于是他接受了这位老人的请求，并于同年九月带他来到福冈。

来到福冈后，成仿吾去拜访郭沫若时，看到他一家挤在当铺仓库的二楼居住，便十分同情。同时自己也要为同乡陈氏租房，所以就建议他们住在一起，以郭夫人富子负责照顾家政为条件。这对郭沫若夫妇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当时郭沫若刚入学需要支付学费，又要购买昂贵的学习参考书，夫妇俩正苦于如何解决这笔费用。就这样，他们在箱崎宫前面一带租下了一栋二层楼房，郭沫若一家住在一楼，陈氏一家和成仿吾住在二楼。住在一块以后，郭沫若就跟成仿吾谈起自己曾与张资平说过的关于创办刊物的事，当即得到了成仿吾的赞同。后来，陈氏的眼睛经过治疗未见好转，就提前回国了，但其房租一直缴到了年底，所以郭沫若得以继续暂住那里。成仿吾也接受了郭沫若等人的劝说，回到东京帝大继续学业。这时距他们搬在一起居住刚过去两周的光景。

随后来到福冈的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田汉。田汉在《创造》杂志上发表《咖啡店之一夜》(1922)等剧本以后，又连续写了多部话剧和电影剧本，参与建构了中国现代话剧。另外，他还成立了南国剧团、南国电影剧团等社团，积极推动左翼剧团和电影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但“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于狱中。田汉是通过宗白华(1897~1986)与郭沫若相识的。当时宗白华是上海《时事新报》杂志社编辑，郭沫若的诗就是经过他编辑以后第一次在该报的文艺栏目《学灯》上刊载的，因此可以说他是诗人郭沫若的发掘者。一九二〇年，田汉、郭沫若和宗白华三人之

间进行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共同讨论艺术方面的各种问题。他们的这些往来书信被收入了同年出版的《三叶集》里。

一九二〇年三月,田汉利用春假来博多访问郭沫若。他到来的时候,正逢郭沫若的二儿子博孙诞生刚满三天,家里的一切杂务自然是郭沫若亲自操持。田汉来后的第三天,郭沫若便摆下刚生产的妻子,陪着田汉到太宰府游玩,次日又一起游览西公园等名胜。由此导致他的妻子无奶、儿子患病的严重后果。后来郭沫若在书中写道,当时田汉看到自己的那种情形说:“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所以似乎感受着很大的失望(均出自《创造十年》)^①。

4 明治专门学校的留学生们

——夏衍和艾思奇

夏衍

这一时期,在日本还有一批当时尚未开始从事文学活动、而后活跃于中国文坛的留学生,夏衍便是其中之一。

夏衍于一九二一年考入明治专门学校电气工程专业,一九二六年毕业。在学期间,他接触了俄罗斯文学,一九二三年以后加入九大学生的读书会,并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关于夏衍在这一时期的有关情况,新谷秀明将在第四章进行介绍。夏衍从明专毕业后,升入九州帝大工学部。他在九州帝大的那段时间里,与其说是学习,还不如说是用留学生的官费来从事政治活动。他于一九二七年回国,不久便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指示从事左翼文艺活动。

^①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69、70页。

夏衍的文艺创作范围非常广泛,尤其擅长电影和话剧的剧本创作,而且这方面的作品很多。同时,在报告文学的领域里也不乏力作,比如《包身工》就是一部揭露在日本资本家工厂里劳动的中国女工遭受残酷剥削的作品。另外,从抗战末期到国共内战的四十年代,夏衍一边辗转于广州、桂林、香港、重庆等地,一边办报,并承担过很多报刊的编辑工作。巧合的是,这期间作为上司指导其工作的就是郭沫若。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相当于日本文化省)副部长。“文革”时期曾经下台,但“文革”结束后历任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务。一九八五年访问母校九州工业大学(即原来的明治专门学校),并发表了演讲。

艾思奇

夏衍毕业后的第四年,艾思奇(1910~1966)也考入了明治专门学校。他的本名叫李生萱,艾思奇是笔名。他出生于云南省,中学时代便通过《新青年》杂志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他与同是云南出生的聂耳(1912~1935,在藤泽市鹄沼海岸一带游泳时溺水而亡)交情笃深。艾思奇于一九二七年春来到日本,并在当时东京的社会主义者举办的读书会上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后来因贫困和过度疲劳而患病,一年之后便回了国。一九三〇年病愈后重返日本,继续在明治专门学校学习。一九三一年发生卢沟桥事变,艾思奇因抗议日本又回到国内。他回国后,于一九三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出版《大众哲学》,在这部著作中,他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也因此逐渐有了名气。但是,他与文学结缘,则是因为他领导了四十年代